

特稿

## 埃尔多安“新土耳其”论与 “土耳其模式”的危机\*

刘 义

**摘 要:** 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政变是中东变局以来的又一个高潮事件,其标志着埃尔多安倡导的“新土耳其”论和“土耳其模式”同时陷入危机。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新土耳其”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强势民主、活力经济和积极外交等思想主张,背后隐藏的却是伊斯兰主义的回归,并被解释为对凯末尔主义传统的超越。在国内层面,正义与发展党连续数次选举成功后,伊斯兰民主逐步演化为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选举霸权;在国际层面,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变动提升了土耳其扩张主义的野心。在土耳其与大国的新一轮博弈中,埃尔多安再次表现出反复无常的特性。未来土耳其的政治走向已成为影响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变量。

**关键词:** “新土耳其”;“土耳其模式”;正义与发展党;埃尔多安

**作者简介:** 刘义,博士,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 200444)。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7)01-0003-1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未遂政变是自2010年底中东变局以来的又一个高潮事件。曾被视为转型阿拉伯国家学习“样板”的“土耳其模式”近年来随着土耳其国内政治动荡和安全局势持续恶化而遭受严重挫折,对地区及全球政治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土耳其地跨欧亚大陆,拥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和民族文化。在从帝国到共和国的近代变革中,土耳其的现代化、民主化和亲西方立场使其迥异于其他中东伊斯兰国家而成为一个例外。当前,土耳其正面临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深刻矛盾,经常

\* 本文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教育发展基金会“曙光计划”项目(15SG38)资助。

被称为一个分裂的国家。<sup>①</sup> 正义与发展党 (AKP, 下文简称“正发党”) 自 2002 年执政以来, 在经济发展、民主改革、申请加入欧盟等方面成绩斐然。正发党的成功引起了学界关于“新土耳其”(New Turkey) 的再讨论, 以区别于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推行的凯末尔主义模式。<sup>②</sup> 然而, 在经历了 2007 年的总统选举和 2011 年的议会选举后, 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发党正逐步形成一种选举霸权。2010 年底以来, 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众抗议浪潮以及阿拉伯国家转型使“土耳其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 从 2013 年伊斯坦布尔加济公园 (Gezi Park) 的示威事件开始, 埃尔多安的威权统治不断受到挑战。自 2014 年埃尔多安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全民选举的总统以来, 土耳其政治中的民粹主义逐渐走向顶峰。叙利亚内战引发的难民危机和地区恐怖主义抬头对土耳其国内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中东变局以来, 土耳其外交频频受挫, 与邻国关系龃龉不断。在近乎内外交困的格局下, 土耳其国内政治何去何从成为关乎中东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的重要议题。

将历史学与政治学相结合, 通过追溯的方式探索当代问题的历史脉络, 已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新趋势。本文以 2002~2016 年间正发党的连续执政为背景, 集中探讨“新土耳其”论和“土耳其模式”两个关键命题, 分析和评述正发党的执政进程。

## 一、“新土耳其”论的内涵

2014 年 8 月, 在历经从伊斯坦布尔市长到土耳其总理的漫长政治生涯后, 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ğan) 成功当选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全民选举的总统。埃尔多安当选土耳其总统被视为是“国民意志”的胜利, 也成为土耳其政治从议会制向总统制过渡的重要步骤。土耳其总统的弱势地位被划分为消极型和维持现状型, 同其比较接近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图尔古特·厄扎尔 (Turgut Özal) 所代表的改革型总统, 埃尔多安则被认为是建设型总统。埃尔多安在土耳其政坛上的持续性统治更多地被解读为一种“特殊现象”, 即具有后凯末尔主义、后西方、后威斯特伐利亚特征的“新土耳其”。“通过创造一种新的实体政治和新的政治单位以转化自身及所处的地区, 土耳其也希望改变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全球

---

<sup>①</sup> 参见 Vojtech Mastny and R. Craig Nation, *Turkey Between East and West: New Challenges for a Rising Regional Powe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Sina Akşin,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the Emergence of the Turkish Nation from 1789 to Present*, Dexter H. Mursaloğlu, trans.,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7; Zeyno Baran, *Torn Country: Turkey Between Secularism and Islamism*,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10.

<sup>②</sup> M. Hakan Yavuz, e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urkey: Democracy and the AK Parti*, Salt Lake City, UT: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6; Graham E. Fuller, *The New Turkish Republic: Turkey as a Pivotal State in the Muslim World*,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7.

政治,以及相应地由西方制定的国际秩序。”<sup>①</sup>“新土耳其”意味着一种新的国家、新的地区和新的全球秩序。然而,这种政治模式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埃尔多安强烈的个人色彩,同时也符合共和国成立以来土耳其政治变迁的基本模式,即个人魅力超越政党政治。

埃尔多安当选为土耳其总统后,曾担任外交部长的艾赫迈特·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接替其成为土耳其新总理。达武特奥卢是正发党时期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多维度外交、邻国零问题外交、制度行为体、国际合作、积极外交等是当时土耳其外交的关键词。<sup>②</sup>达武特奥卢被视作埃尔多安建设“新土耳其”的最佳拍档,他的思维能力、适应技巧、工作态度都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最关键的是,达武特奥卢甘愿充当埃尔多安强人政治的副手。<sup>③</sup>在埃尔多安当选土耳其总统的当月,达武特奥卢对“新土耳其”的内涵作出了系统阐释,主要包括三个重要概念:强势民主、活力经济和积极外交。达武特奥卢认为,土耳其自近代以来经历了三次伟大复兴,即坦齐马特改革(Tanzimat)、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向民主制和多党制的转变。冷战后国际格局转变的时代背景为土耳其实现第四次伟大复兴提供了机遇。“过去十年间,土耳其的国内政策强调深化民主,通过推行积极的经济政策巩固自身实力,为制定外交政策提供了持续性的机制,这将促使土耳其实现复兴,成为积极参与全球体系转型的代表。”<sup>④</sup>如果说埃尔多安是“新土耳其”论的形象代言人,那么具有学术生涯背景的达武特奥卢则是“新土耳其”论的最佳诠释者。然而,这对“最佳拍档”背后的隐忧在于,达武特奥卢教授是否具有充当强人埃尔多安传声筒的持久意愿。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当时即被称为“新土耳其”,以区别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伊斯兰政权统治。<sup>⑤</sup>从本质上看,埃尔多安时期“新土耳其”中的“新”,是对“旧”的回归和超越,即伊斯兰传统和民主政治的结合。然而,很快有学者对“新土耳其”论提出了质疑,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新土耳其”是否比以通货膨胀、公债、低效率、腐败等为主要特征的“旧土耳其”更民主?在内政方面,军人势力的崛起给民选官员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在外交方面,土耳其作为伊斯兰民主的代表在中东地区仍缺乏软实力方面的影响。但是,“新土耳其”论在内政外交上并没有太多新的变化。相反,先前由军人主导的土

<sup>①</sup> Nebi Miş and Ali Aslan, “Erdoğan’s Politics and His Presidential Mission,” Ankara: SETA/Found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2014, p. 26.

<sup>②</sup> Ahmet Davutoğlu, “Principles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 Political Structuring,” Ankara: SAM/Center for Strategic Research, 2012.

<sup>③</sup> “Erdoğan and Davutoğlu: the Right Formula for New Turkey,” *Daily Sabah*, August 23, 2014.

<sup>④</sup> Ahmet Davutoğlu, “The Restoration of Turkey: Strong Democracy, Dynamic Economy, and Active Diplomacy,” Ankara: SAM/Center for Strategic Research, 2014, pp. 7-8.

<sup>⑤</sup> 关于凯末尔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详见 Patrick Kinross, *Ataturk: The Rebirth of a Nati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12.

土耳其威权政治,如今只是被以多数专制和埃尔多安的霸权为基础的“新”形式所取代。<sup>①</sup>与此同时,达武特奥卢的个人品格和意识形态也广受争议,尤其是他能否与一位强势总统开展良好的合作成为争议的焦点。<sup>②</sup>

2016 年 5 月,在经过议会选举的艰难胜利以及同欧盟签订关于难民和自由签证的交换协议后,达武特奥卢辞去总理和正发党主席的职务。这一事件背后的原因,无疑同达武特奥卢和总统埃尔多安之间深刻的矛盾与分歧密切相关。<sup>③</sup>同样作为“新土耳其”论的重要奠基者和诠释者,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ül)和达武特奥卢的离职,使埃尔多安成为土耳其“唯一的领袖”。这种权力的集中化和个人化已成为“新土耳其”的一个顽疾。

## 二、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伊斯兰民主实践

2002 年,奉行温和伊斯兰主义的正发党赢得土耳其议会选举,开启了之后十余年的连续执政。正发党的执政被称为是伊斯兰与民主相结合的典范。著名学者哈坎·雅乌兹(Hakan Yavuz)认为,“正发党的身份取决于它想掩饰的伊斯兰主义和想公开奉行的保守民主制”<sup>④</sup>,两者之间既有结合,也有冲突。雅乌兹从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解释了土耳其的保守民主制:家庭观念(父权式的)、以奥斯曼历史为基础的爱国主义(热爱穆斯林—土耳其国家)和虔诚(道德的来源)。“保守民主制基于一种关于土耳其民族作为理想模型的特殊理解,即逊尼派与土耳其民族的统一体,没有文化和阶级的差异,同国家相一致。”<sup>⑤</sup>社会保守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是正发党奉行的两大道路,这不但赢得了土耳其国内选民的支持,也得到了后“9·11”时期西方政治势力的赞扬。土耳其作为政治伊斯兰的例外,成为了连接欧美和中东地区的桥梁。

正发党的成功首先归因于其推行的经济政策。正发党执政时期,土耳其继承了厄扎尔在 20 世纪 90 年代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然而,同厄扎尔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加剧不同的是,正发党采取了严格的金融政策,使得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得以双轮驱动。在正发党执政的十多年间,土耳其的 GDP 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6.5% 左右,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高经济增长率;人均 GDP 从 3,492 美元飙升至 10,504 美元。即便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土耳其经济仍保持了持续

<sup>①</sup> Ömer Taşpınar, “New Turkey and Its Paradox (1),” *Today's Zaman*, April 13, 2014; Ömer Taşpınar, “New Turkey and Its Paradox (2),” *Today's Zaman*, April 20, 2014.

<sup>②</sup> Ömer Taşpınar, “Ambivalence about Davutoğlu,” *Today's Zaman*, August 24, 2014.

<sup>③</sup> “Davutoğlu Stepping Down as Turkish PM, AKP to Hold Snap Congress,” *Hürriyet Daily News*, May 5, 2016.

<sup>④</sup> M. Hakan Yavuz, *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

<sup>⑤</sup> *Ibid.*, p. 100.

增长的旺盛势头。同时,土耳其对外来资金的依赖也大大降低,突出表现在土耳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系的变化上。土耳其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64 个借贷国家中债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 2002 年始,土耳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了 235 亿美元的债务。至 2013 年,土耳其不仅偿清了所有债务,而且开始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2013 年,土耳其成为世界第十七大经济体,并希望在 2023 年土耳其建国一百年之际进入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之列。<sup>①</sup> 2015 年,二十国(G20)峰会在土耳其召开,彰显了土耳其经济的国际影响。简言之,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成为正发党执政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础。

加入欧盟是正发党执政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目标。自 1999 年获得欧盟候选成员国身份后,土耳其于 2005 年正式启动了加入欧盟的谈判。申请入欧反过来推动了土耳其国内民主政治的改革进程。尽管土耳其的伊斯兰国家身份是加入欧盟的最大障碍,但入盟谈判确实推动了一种以自由主义和公共参与为特征的新政治文化在土耳其的兴起,<sup>②</sup>宪法的修改成为其中突出的例子。土耳其目前的宪法是在 1980 年政变后由军人政府制定的。2004 年,土耳其议会通过了 9 条宪法修正案,包括确立性别平等的宪法保障、取消所有关于罚款的条款、取消军队总司令任命高等教育委员会成员的权利、取消国家安全法庭(State Security Court)等。此次修宪最突出的一项成果是,规定了在涉及基本人权和自由方面,国际公约可凌驾于国内法律之上。<sup>③</sup> 2009 年,正发党领导的政府开启了关于“向库尔德人开放(Kurdish Opening)”的讨论,后改为“向民主开放(Democratic Opening)”,之后又变为“国家统一和友爱工程(National Unity and Fraternity Project)”,被视为土耳其推行民主改革的另一大重要措施。<sup>④</sup>

土耳其对伊斯兰与民主相结合的政治实践,成为“9·11”事件后国际政治的一个特殊案例。在土耳其,这一政治实践表现为政治伊斯兰的双重转型,即以纳吉迈廷·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为代表的“民族观念(Milli Görüş)”运动和以居伦(Fethullah Gülen)为代表的服务网络(Hizmet)的结合。特别是二者在“文明对话”领域开展的合作,使人们在全球话语中看到了伊斯兰政治的不同形象。<sup>⑤</sup> 然而,“温和

<sup>①</sup> Erdal Tanas Karagöl, “The Turkish Economy During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Decade,” *Insight Turkey*, Vol. 15, No. 4, 2013, pp. 115–129.

<sup>②</sup> 关于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问题,参见 Mirela Bogdani, *Turkey and the Dilemma of EU Accession: When Religion Meets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11; Ioannis N. Grigoriadis, *Trials of Europeanization: Turkish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sup>③</sup> Vahap Coşkun,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Under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Rule,” *Insight Turkey*, Vol. 15, No. 4, 2013, pp. 95–113.

<sup>④</sup> Yılmaz Ensaroglu, “Turkey’s Kurdish Question and the Peace Process,” *Insight Turkey*, Vol. 15, No. 2, 2013, pp. 7–17.

<sup>⑤</sup> Ahmet T. Kuru,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Islamism and Secularism in Turkey: The Gülen Movement and the AK Party,” in Louis J. Cantori, Marcia K. Hermansen and David B. Capes, eds., *Muslim World in Transition: Contributions of the Gülen Movement*, London: 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40–151.

穆斯林(moderate Muslims)”与“公民伊斯兰(civil Islam)”的论题,从一开始就带有美国外交战略的含义,这无疑增添了国际势力介入的风险。<sup>①</sup> 果不其然,当土耳其和美国在中东事务中发生利益冲突后,流亡美国的居伦被指控为美中央情报局(CIA)的代理人,其同正发党政府之间的对抗也日益加剧。居伦势力与正发党的矛盾在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期间达到顶峰,正发党政府直接将“居伦运动”定性为恐怖组织。伊斯兰民主似乎在一夜间转变为暴力与恐怖主义,土耳其从例外论回到了政治伊斯兰的传统。

### 三、正义与发展党的选举霸权

随着正发党日益确立其威权统治,民主制却被打上了工具主义和多数主义的标签,成为土耳其政治发展的悖论,正发党因此形成了一种“选举霸权(electoral hegemony)”。2007年正发党进入第二执政期后,土耳其政治出现了重要转折点。有学者指出,“正发党依靠‘选举霸权’控制了土耳其的议会、政府和总统,从而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于政党领袖手中,并导致早已千疮百孔的检察和制衡体系破产”<sup>②</sup>。正发党不仅没有严肃对待这一问题,反而进一步激化了这一问题。具体来说,正发党在第二任期的执政在三个方面出现了重要变化:一是从经济增长和善治向强势安全导向的政治思维转变;二是从服务和改革导向的治理模式向群体利益和敌我对立的政治模式转变;三是从包容性和接纳性的话语向狭隘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话语的转变。<sup>③</sup> 正发党的统治日益趋同于早期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政府,甚至被戏称为“宗教凯末尔主义(religious Kemalism)”。

土耳其政治威权化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无论在政党层面还是政府层面,权力都日益集中于埃尔多安个人手中。因此,埃尔多安个人威权的加强,不仅意味着一党专权,更意味着权力的个人化。这种趋势符合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政治变迁的模式,但在埃尔多安的任期内无疑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如果对比加入欧盟的民主化进程和以普京为代表的俄罗斯强人政治,土耳其的这种趋势就体现得更加明显。作为正发党两大创始人之一并历任土耳其总理(2002~2003年)、外交部长(2003~2007年)和总统(2007~2014年)的阿卜杜拉·居尔,从跟埃尔多安“并驾齐驱”到“貌合神离”,至最后退出土耳其政坛,无疑是埃尔多安权力个人化造成领导人分歧加剧的典型表现,并为日后达武特奥卢的下台提供了前车之鉴。

居尔被认为是“新土耳其”论的重要缔造者,尤其是在理念和原则层面对“新土

<sup>①</sup> 刘义:《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公民伊斯兰理论与实践》,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4期,第84-97页。

<sup>②</sup> E. Fuat Keyman and Sebnem Gumuscu, *Democracy,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urkey: Hegemony Through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50.

<sup>③</sup> Ibid.

耳其”模式做出了重要贡献。居尔和埃尔多安都成名于埃尔巴坎领导的福利党(Welfare Party, RP)时代。在后福利党时期,居尔成为改革派的重要一员,其领导的总部设在安卡拉的政治研究中心(Political Research Center)奠定了正发党的基本理念,同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的显赫政绩形成了呼应。相对于埃尔多安在广大民众眼中克里斯玛型(charisma)领导人的魅力,居尔更熟悉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规则,在行为上也更加谨慎,被视为正发党的设计者。最初,居尔和埃尔多安只被认为在性格上存在不同。然而,“在他的任期内,居尔的政治风格、经验、知识及其对土耳其的国际愿景,同埃尔多安存在显著区别”<sup>①</sup>。两人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任命了不同的顾问集团,在提升土耳其国际地位方面出现了不同意见,对民主和社会公正的看法也存在分歧。在处理2013年加济公园示威活动和腐败案期间,居尔和埃尔多安的矛盾日益凸显。最终,在2014年埃尔多安成功当选总统后,居尔选择退出政坛。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埃尔多安的权力日益集中和个人化。在2014年总统选举前,埃尔多安的追随者专门撰写了一本歌颂他的小册子,主题为“勇敢的心:新土耳其之父(The Brave Heart: The Father of New Turkey)”。正发党执政时期在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国际化、社会改革等领域的各项业绩,都被归结为埃尔多安的个人成就。为表达对埃尔多安的敬仰之情,作者还专门作了一首颂词:“他是诚实的,他是勇敢的,他是骄傲的,他是荣耀的,他是充满情感的,他是激情的,他是富于机智的,他是一贯的,他是自信的,他是宽容的,他是正派的,他是谦虚的,他始终相信,他从不向非正义低头,他是劳动人民的激励者,他是穷人的父亲,重中之重是他热爱那些因造物主而受造的。”<sup>②</sup>

埃尔多安作为克里斯玛型领导人是土耳其在世纪之交形成的“本土政治(vernacular politics)”的产物,即“一种社区和价值中心的政治进程,尽管扎根于地方,却能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团结在国家政治中”<sup>③</sup>,这同土耳其传统的世俗政治精英的策略形成了强烈反差,其中不仅有正发党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成分,而且更多地依赖于地方文化和个人间关系,以及借用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的功效。

埃尔多安的权力集中化也导致了围绕其个人统治而形成的政治分裂。在土耳其政坛,支持和反对埃尔多安的人分化为两大阵营,并延伸至社会的各个方面。2014年埃尔多安竞选总统时,美国皮尤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4%的土耳其民众满意目前土耳其的发展方向,51%不满意;50%的土耳其民众认为目前土耳其经济状况良好,46%认为经济形势比较糟糕;48%的土耳其民众认为埃尔多安给土耳其带来了积

<sup>①</sup> Gerald MacLean, *Abdullah Gül and the Making of the New Turkey*, London: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14, p. 288.

<sup>②</sup> Ömer Gökhan Ulum, *Recep Tayyip Erdoğan: The Brave Heart: The Father of New Turkey*, Frederick, MD: America Star Books, 2014, p. 3.

<sup>③</sup> Jenny B. White, *Islamist Mobilization in Turkey: A Study in Vernacular Politic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p. 6.

极影响,也有 48% 的土耳其民众认为埃尔多安带来了负面影响;49% 的土耳其人声称支持 2013 年土耳其国内的反政府游行,特别是加济公园的示威活动,55% 的土耳其人不认同埃尔多安对该事件的处理方式;69% 的土耳其人认为伊斯兰教在土耳其政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其中 47% 的土耳其人认为其影响是积极的,26% 的土耳其人认为其影响较小。可见,土耳其因埃尔多安个人而变成了一个“分裂的国家”。<sup>①</sup> 这种分裂超越了土耳其传统的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义之争,以及因不同政党形成的立场分歧,这是一种基于对领袖个人魅力的崇拜和诋毁而形成的政治分歧。

#### 四、土耳其的新奥斯曼主义外交

如果说“新土耳其”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限于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变化,那么“土耳其模式”从一开始就是该国在国际舞台运用的外交工具。在达武特奥卢的影响下,正发党时期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呈现出强调和利用奥斯曼帝国传统的趋势。近年来,土耳其外交在加强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也相应地表现出向中东和中亚等地区的扩张倾向,是同时包含了“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和“泛突厥主义”倾向的“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sup>②</sup> 土耳其这种带有明显扩张色彩的外交政策,既是该国内政的延伸,又是对内政的呼应。

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以达武特奥卢的“战略纵深(strategic depth)”理论为基础,以“邻国零问题(Zero Problem with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外交为重要目标。这一外交政策的基本观点在于,“欧亚大陆及其周边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有着至为重要的地位,土耳其处于这一广大领土的中心,具备独一无二的机会来扩张自身影响和创造战略纵深。如此,它将确立自己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并在创造新的全球机制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这一机制将更符合不同文明或文化精神。土耳其如今的外交政策同过去的外交政策相背离,其关于地缘政治的诠释基于一个前提,即西方势力在巴尔干、中亚和中东的扩张不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因此必须扭转这种状况”<sup>③</sup>。

达武特奥卢认为,奥斯曼的政治力量源于“认主独一(tawhid)”和“奉主神圣(tanzih)”,这成为处理伊斯兰世界冲突的主要范式。同时,他将此理论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相对立,批评两者的理论主要服务于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的扩张政策。

① “Turkey Divided on Erdogan and the Country’s Direction,”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July 30, 2014.

② Ehud R. Toledano, “Some Thoughts on the Ottomans and Neo-Ottomanism,” *Turkish Review*, Vol. 3, No. 1, 2013, pp. 8-13.

③ Aaron Stein, *Turkey’s New Foreign Policy: Davutoglu, the AKP and the Pursuit of Regional Order*, London: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2014, p. 2.



2002年执政伊始,正发党实际上采取了多元主义的外交政策,结合了战略纵深和现实主义政治<sup>①</sup>的某些因素。在叙利亚、伊朗及海湾国家的问题上,土耳其选择尊重现状,忽略这些国家在政治和民主制度方面的缺陷,而是强调开展对话和加强贸易往来。但在2003年后的伊拉克大选中,土耳其选择支持具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伊拉克伊斯兰党(Iraqi Islamic Party, IIP)。同时,正发党支持哈马斯在加沙地区的领导地位。总体而言,土耳其在该时期更多地是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在2010年底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土耳其支持突尼斯、埃及和叙利亚等国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以及具有穆兄会背景的伊斯兰势力。西方国家则鼓吹阿拉伯国家应采取伊斯兰与民主相结合的“土耳其模式”,试图在话语上影响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变革。2012年底至2013年初,达武特奥卢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东地缘政治的论述,预言民族主义作为中东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已经走向终结,伊斯兰政治力量将发挥重要作用。2012年叙利亚内战升级和2013年7月埃及军方罢黜民选总统穆尔西的事件,导致土耳其在中东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但土耳其仍认为自己处于历史中的正确一方,批评西方国家不负责任的态度,从而享受一种“珍贵的孤立(precious loneliness)”<sup>②</sup>。

土耳其的中东政策也导致其同西方盟友的分裂渐深。美国批评土耳其没有对美中东政策给予足够支持,而是在地区问题上采取独立或相反的外交政策,甚至批评西方盟友,跟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交往,表现得“很不像一个北约盟国”。土耳其则认为,美国对土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缺乏“足够的敏感(sufficient sensitivity)”<sup>③</sup>。“邻国零问题”政策是近年来土耳其中东外交的战略转向,它无疑使得土耳其和美国利益分歧加深。即使在中东剧变中,相对于西方国家鼓吹“土耳其模式”的责任,土耳其更在乎“中东社会如何看待一个在共和国历史上曾经背弃它们的国家的形象”<sup>④</sup>。尽管存在这一历史问题,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积极形象犹存,特别是其经济快速稳健的增长、社会稳定、果断且灵活的外交政策、自由的社会氛围和有效的政治改革仍是阿拉伯国家效仿的对象。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耳其和美国因各自的叙利亚政策导致双方的分歧几近白热化。“土耳其政府将叙利亚视为进入中东的门户,奥巴马政府则将叙利亚看作其地区政策的关键。”<sup>⑤</sup>当人道主义危机演化为安全威胁,甚至社会问题时,土耳其对美国的不信任也与日俱增,尤其是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令土美矛盾进一步激化。土耳其将“伊斯兰国”组织视为各种问题叠加的综合症,强调打击该极端组织需要综合施策。美国则认为,“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不同于叙利亚问题。有分析指出,“奥巴马政府希望土耳其接受华盛顿的优先目标,却

① 正发党称之为 *ostpolitik*, 意指西德在冷战时期与东德和解的外交政策。

② Aaron Stein, *Turkey's New Foreign Policy*, pp. 9-10.

③ Kılıç Kanat, "Turkey and the U.S.: The Longest Two Years of the Relations," Ankara: SETA/Found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2015, p. 8.

④ *Ibid.*, pp. 15-16.

⑤ *Ibid.*, p. 16.

没有考虑土耳其的关切”<sup>①</sup>。

2015 年 11 月,土耳其击落了一架在土叙边境飞行的俄罗斯战机,随即引发两国“针锋相对的争论”,普京与埃尔多安之间也爆发了“口水战”。普京声称,“俄战机被土击落事件是被恐怖主义的帮凶在背后捅了一刀”,警告称土方的行为将会带来“严重后果”。埃尔多安则表示,俄罗斯战机侵犯了土耳其的领空权,强调“每个人都必须尊重土耳其保卫边境的权利”。俄战机被土击落事件“仅仅是两国在叙利亚长期斗争的最激烈的阶段”,“叙利亚危机终结了两个长期敌对和不信任的重要势力之间的历史性和解”。<sup>②</sup> 土耳其随后的行为几近歇斯底里,常被解读为是向美国施压,希望后者在叙利亚问题及中东事务上有更多的积极介入。然而,土耳其的“疯狂行动”非但没能奏效,却因俄罗斯的制裁导致土耳其经济利益蒙受严重损失。不久,埃尔多安又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反转,一方面同俄罗斯和解,一方面指控美国参与了 2016 年 7 月的军事政变。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导致了土耳其在大国势力间的失信。

然而,中东政治的动荡远远超出了土耳其的想象。特别是叙利亚内战的溢出效应使土耳其陷入了一个无法抽身的泥潭。对此,有学者指出:“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大马士革,然后再从不同的方向反射回来。经济和军事的援助从保护国和邻国流入叙利亚,包括伊朗、俄罗斯、利比亚、沙特、卡塔尔及其他海湾国家,旨在决定一个宽松的反对派联盟和阿萨德政权之间的冲突结果。相反,这些外部支持可能会深化(叙利亚)国内的既有矛盾,点燃逊尼派和什叶派更广泛的地区冲突,从而形塑中东的政治地理。从很多方面来讲,这是完美的‘圣战’,促使逊尼派和什叶派为争夺在伊斯兰世界的主导地位而持续争战。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双方的极端分子之间的历史仇恨在外溢,恐惧在扩散,并影响着政治情感和机会主义,东北至土耳其和伊拉克,西至黎巴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南至约旦和阿拉伯海湾。”<sup>③</sup>

## 五、“土耳其模式”的危机

叙利亚内战已成为左右近年来中东政治格局的关键变量。其中,土耳其不仅是叙利亚内战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受害者,而且这种关联效应也直接加剧了“土耳其模式”的危机。然而,“新土耳其”命题的重新提出和阐述,却几乎跟“土耳其模式”的危机同步发生。当埃尔多安的个人化统治在国内日益确立时,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和形象却呈现下降趋势。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伊斯兰和民主的悖论。然而,在这些价值命题的背后却体现出土耳其国内政治机制和国际政治格局更深层次的结构矛盾。

<sup>①</sup> Kilic Kanat, “Turkey and the U.S.: The Longest Two Years of the Relations,” p. 24.

<sup>②</sup> Jeffrey Mankoff, “Best of Enemies: The Russia-Turkey Confrontation Beyond Syria,”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nuary 6, 2016.

<sup>③</sup> William Young *et al.*, *Spillover from the Conflict in Syria: An Assessment of the Factors That Aid and Impede the Spread of Violence*, Santa Monica, CA: RAND, 2014, p. 3.

2014年是“土耳其政治最漫长的一年”。事实上,它并非始于2014年1月1日,而是2013年5月的加济公园示威事件;同样,该政治年度结束的时间也要更晚一些,结束于2015年6月的土耳其议会选举。<sup>①</sup>在此次选举中,正发党13年来首次未能形成一党领导的多数政府。<sup>②</sup>尽管正发党在当年11月份重新胜选,但在过渡政府的空档期内,却开启了土耳其政治急剧动荡的模式。土耳其尽管加入了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反恐斗争,但同时却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应对库尔德工人党(PKK)上。地区和国内双重恐怖威胁引发了土耳其境内一系列暴恐事件的发生。<sup>③</sup>土耳其越来越像一个中东国家,而不是之前中东国家向往的“模板国家”,这预示着“土耳其模式”的危机。

学界首先从土耳其国内政治的逻辑来分析,即从伊斯兰民主到选举霸权的转变历程审视“土耳其模式”危机的原因。如厄莫尔·塔什皮纳尔(Ömer Taşpınar)所言,“土耳其民主模式不会因为伊斯兰教和世俗主义的冲突而走向终结;相反,真正的冲突存在于选举民主和自由主义之间”。埃尔多安存在将民主简化为选举的倾向,他以民粹主义处理政治的方式是以牺牲个人权利和自由、独立媒体、三权分立为代价的。“在他(埃尔多安)的统治下,土耳其模式的兴衰成为非自由民主、弱势民主制度和政治传统的神话。”<sup>④</sup>埃尔多安的统治表面上体现为选举民主,背后却是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逻辑。因此,随着民主的日益工具化,专制的倾向逐渐凸显。这已不再是伊斯兰教和世俗主义的问题,而是土耳其的政治文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埃尔多安的权力个人化体现了对凯末尔主义政权模式的延续。

也有学者作了更加深刻的反省,认为“土耳其模式”虽然实现于正发党治下,却奠基于20世纪80年代的土耳其军政府时期,主张“土耳其模式”的诞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冷战政治的矛盾结合体。1968年世界范围内的学生暴动和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在全球层面引起的动力、希望和恐惧过于丰富和激烈,以致中东当时既有的方式和方法都不足以应对。因此,必须通过创造性的方式来应对。1980年由凯南·埃夫伦(Kenan Evren)将军领导的土耳其军政府以及由厄扎尔领导土耳其保守主义的温和伊斯兰化模式开启了土耳其政治新的篇章。解除威胁的唯一方式就是反动员。在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政府承诺支持次一级的阶层,以针对世俗精

<sup>①</sup> Taha Özhan, “The Longest Year of Turkish Politics: 2014,” *Insight Turkey*, Vol. 16. No. 2, 2014, pp. 79-98.

<sup>②</sup> Kılıç Kanat, “Elections in Turkey,” Ankara: SETA/Found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October 2015.

<sup>③</sup> Osman Orsal, “From ISIS to the Kurds to Erdogan: Why Turkey is in Serious Trouble,” *The Atlantic*, October 5, 2015.

<sup>④</sup> Ömer Taşpınar, “The End of the Turkish Model,”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 56, No. 2, 2014, pp. 49-64.

英、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sup>①</sup>。

工人的反抗、库尔德人起义和伊朗革命被认为是三个最重要的目标。“土耳其模式”作为一种“消极革命(passive revolution)”,从一开始似乎就缺乏合理的社会基础,因而表现为由具体政治利益催生的矛盾体。

如果我们对土耳其民主的历史进行简单回顾,便能发现它是土耳其政治社会更深层次矛盾的深刻写照。有学者指出,在土耳其社会,对凯末尔主义政权的反对“并没有导致民主的进程,而是走向了新霸权的重组”<sup>②</sup>。1938~1950 年伊斯麦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执政时期,土耳其政府的改革并没有保证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参与、社会阶层的分化、自由言论的表达等;相反,改革却使土耳其政府体系独立于社会,形成了专家、职业政客和军方的政治主导。“在这一处境下,不仅官僚和职业政客控制政治权力,而且质疑主导意识形态的群体也在狭隘的话语框架内如此行事。”<sup>③</sup>这就促使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在参照同样的政治模式运作;无论谁上台执政,政治体制都难以实现机制性的变革,反对派的产生和政党轮替并不能导致民主机制的产生。

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学界关于土耳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特别是对凯末尔主义传统的进一步反思。<sup>④</sup>从表面上看,土耳其的政治文化是以民族主义、共和主义、世俗主义为特征,但实质上却是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军事主义的结合体。土耳其政治自凯末尔到埃尔多安的发展,体现了从世俗主义到伊斯兰主义的再次变迁;然而,其中不变的却是威权政治、民粹主义和军人干政的传统。从一种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这甚至可以追溯至奥斯曼时期的政治传统。同时,对“土耳其模式”的反思,必须置于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考察。有土耳其学者指出,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的中东政策体现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利益和价值在国际政治中的矛盾。<sup>⑤</sup>“土耳其模式”的失效,反映了土耳其作为地区力量的尴尬地位——寻求自主和扩张,却受限于更广泛的全球政治和大国势力。土耳其的政策摇摆很大程度上是上述两对矛盾角色的无奈结果。当人们回顾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关于“国内和平、世界和平(Peace at Home, Peace in the World)”的政治遗产时,埃尔多安和达武特奥卢的谬误立即昭然若揭。土耳其要实现民族的再次复兴,实在有待更恰当、更理性的政治考量。

<sup>①</sup> Cihan Tuğal, *The Fall of the Turkish Model: How the Arab Uprisings Brought Down Islamic Liberalism*, London: Verso, 2016, p. 25.

<sup>②</sup> John M. Vander Lippe, *The Politics of Turkish Democracy: İsmet İnönü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ulti-Party System, 1938-1950*,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 3.

<sup>③</sup> Ibid.

<sup>④</sup> 刘义:《伊斯兰教、民族国家及世俗主义——土耳其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载《世界宗教文化》2015 年第 1 期,第 38-46 页。

<sup>⑤</sup> Hasan Kösebalaban, “Turkey and the New Middle East: Between Liberalism and Realism,” *Percep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6, No. 3, 2011, pp. 93-114; Ziya Öniş, “Turkey and the Arab Spring: Between Ethics and Self-Interest,” *Insight Turkey*, Vol. 14, No. 3, 2012, pp. 45-63.

## 六、余论

2016年7月的未遂军事政变将土耳其再次推向了国际政治的前沿。<sup>①</sup>这场政变是继1960年、1971年、1980年以来土耳其发生的第四次暴力“军事政变”，如果算上1997年的“后现代政变(postmodern coup)”和2007年的“软政变(soft coup)”，土耳其政治似乎难逃每十年一次的政治危机循环。关于政变的原因，政界和学界存在诸多猜测。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政变之后的政治清洗进一步强化了埃尔多安个人权力的集中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相关部门早在政变数月前就预测到了土耳其再次爆发军事政变的可能，并指出埃尔多安的威权政治是其中的关键原因之一。<sup>②</sup>如果说埃尔多安是此次政变的最大赢家，那么土耳其政治似乎正在走向另一个深渊。这仿佛一个仪式，宣告了“新土耳其”和“土耳其模式”同时陷入严重危机。土耳其能否继续曾经的经济神话尚不得而知，但伊斯兰与民主的结合似乎已被证明失败，土耳其在地区和全球政治中的威信也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对中国来说，土耳其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国家。然而，中土经贸关系更多是竞争性而非互补性的；从政治角度讲，双方还存在冷战背景和相关民族问题的矛盾；而最根本的问题则是双方因地理距离和文化差距而产生的不理解和不信任。埃尔多安主导下的土耳其政治反复无常的特征，在购买中国红旗导弹的问题上也有充分体现。<sup>③</sup>土耳其以连接欧亚大陆的桥头堡和东西文化的交汇点而著称，然而这种地缘优势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风险。伊斯兰化倾向在土耳其政治中的增强，可能为日益频繁的中土经贸往来注入不稳定因素。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土耳其的外交战略需要秉持更综合、更审慎的态度，在促进经贸关系的同时务必规避政治层面的风险。特别是中国需要提防在大国角逐格局下土耳其的利益权衡和政策选择，包括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甚至是来自东亚地区的日韩势力。

(责任编辑：赵 军)

<sup>①</sup> Murat Yeşiltaş and Necdet Özçelik, “Turkey’s Stillborn Junta Coup Attempt: Process, Responses and Prospects,” *Analysis*, No. 19, Ankara: SETA/Found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July 2016.

<sup>②</sup> Gonul Tol, “Turkey’s Next Military Coup: How Empowering the Generals Could Backfire,” *Foreign Affairs*, May 30, 2016.

<sup>③</sup> 吴奇俊、王三义：《中国—土耳其关系的新路径与机制》，载郭长刚、刘义主编：《土耳其发展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99—226页。